

中国民族学学会 编

民族学研究

第十二辑

民族出版社

民族学研究

第十二辑

中国民族学学会 编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敦朴

装帧设计:金 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学研究 第12辑/中国民族学学会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10

ISBN 7-105-03256-1

I. 民… II. ①夏…②何… III. 民族学—研究—文集 IV
.C91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45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久久微机照排 民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375 字数:320千字

印数:0001—600册 定价:22.00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中国民族学学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会场



中国民族学学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
分组讨论会会场



北京中华民族园一瞥
——美丽的傣寨



中国民族学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日于西双版纳

前 言

1997 年 11 月，中国民族学学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在云南省景洪市召开。会议主题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共收到论文八十余篇，本辑系从这些论文中选编而成。有的文章的某些论点可能会有争议，编者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文中观点未作改动。

本辑由北京中华民族园赞助出版，特此致谢。

本辑由夏之乾、何星亮主编，满都尔图先生参加选稿，并审阅了部分稿件。

目 录

开幕词	宋蜀华 (1)
贺 信	马 曜 (7)
中国民族学学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纪要	满都尔图 (13)
前进中的中国民族学	
——对新中国民族学发展历程的回顾	马启成 (20)
中国民族学的现状及值得思考的若干问题	
——中国民族学学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上	
的发言要点	满都尔图 (29)
我国民族学的“本土化”及其未来	郭大烈 (37)
中国民族学的世纪历程与未来任务	张有隽 (51)
继承、综合、创新	
——世纪之交发展和完善中国民族学的思考	何星亮 (61)
从比较的视角前瞻“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	和少英 (84)
略说新时期的中国民族学	詹承绪 (92)
中国民族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宋 涛 (110)
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中国特色	
——世纪之交中国民族学的一点思考	夏之乾 (120)
跨世纪民族学的重要课题	曹成章 (130)
抓住机遇，推动新世纪的中国民族学	
走向世界	王筑生 (138)
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及未来走向	徐杰舜 (143)
略谈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地位	姜永兴 (155)
世纪之交反思中国民族学	翁乃群 (164)
21 世纪：实践的社会文化人类学	纳日碧力戈 (177)

民族学在贵州的发展历程及展望	陈国安 (188)
我国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前瞻	李绍明 (201)
论民族经济学	施正一 (212)
少数民族法文化研究应与民族法制研究 相结合	周 星 (236)
城市民族问题：21 世纪中国民族学研究 的重要课题	孙秋云、朱绍华 (251)
论文化与民族关系	白振声 (259)
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研究在民族学中的意义 ——兼谈满族传统文化发展变化的特点	张佳生 (269)
研究和普及民族学的重要基地—— 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	解立红 (278)
凉山彝族传统家支功能的现代调适	冯 敏、伍精忠 (292)
文化的多链共生	王晓丽 (308)
对西部民族地区人才问题的 理论分析	刘士儒、邓康宁 (321)
论民族社会史研究及其在当代的几个问题	郑晓云 (330)
傣族稻作文化体系中的农耕礼俗与精神 观念研究	郭家骥 (344)
论东巴教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	杨福泉 (361)
茶马贸易与边茶文化	聂静洁 (376)
当代基诺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分区	吴应辉 (388)
客家人生礼仪象征研究	曾少聪 (400)
社会变迁中的民族地区电影事业 ——甘孜州电影事业现状调查研究	李宗放 (411)

开 幕 词

宋蜀华

中国民族学学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现在开幕了。这一届会议是由中国民族学学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这次会议能在风光如画、热情好客和驰名中外的西双版纳举行，不仅体现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和同行之间的密切合作和对学会工作的热情支持，更体现了云南省领导的关怀和帮助，特别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多方协助，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优越的条件和周到的服务。在此，我代表中国民族学学会向省、自治州领导表示深切的谢意。热烈欢迎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和同行们前来参加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是一次世纪之交的会议，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的盛会，因而具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这次会议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党的指示精神，认真回顾新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历程，分析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现状，探讨 21 世纪中国民族学发展目标和任务，为推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因此，我们把会议的主题定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即中国民族学的回顾、现状与前瞻，就是想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请同行们就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学所走过的道路、现状和今后如何发展，各就亲身的体会，见仁见智，互相交流，各抒己见。

下面我想谈三点意见，请大家批评。

第一，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

民族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有起有伏，直到作为一个学科被取消，最后又重新恢复，并获得显著发展。大家知道，民族学是以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故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包括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氏族、部落、民族等族群，以动态的观点研究其历史发展规律，以及生产、生活、社会组织、习俗信仰等物质文化、社团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全部内容。因而民族学是一门理论和应用并重的科学。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和多生态环境的国家，即使在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的时期，由于民族工作的需要，民族学的研究工作仍旧没有中断。

在过去的实践中，首先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得到进一步确认。中国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因此，把中国各民族首先是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是中国民族学的主要任务。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学所走过的道路，可以说主要是为少数民族服务，在服务过程中得到发展的道路。民族学在对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诸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 50 年代到今天，在座的许多同志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并反映在大家的教学和科研成果中。

但是，正如我在 1995 年大连会议上所指出的，把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少数民族，这是不完全的，而且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少数民族研究。如果这样的话，在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概念中，就体现不出汉族的重要作用及其与兄弟民族之间的历史性的密切联系，因而对汉族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还有，国外民族也是中国民族学者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处于开放性的世界格局中，对国外民族的研究自然是不可少的。然而，为少数民族服务，促进民族地区现代化，仍然居于主要地位。

其次，50 年代也是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

中国民族学的确立时期。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社会改革前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民族志资料，无不证明民族社会发展有规律可寻。但是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采取教条主义态度，而应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状况，进行具体分析，这样也有利于学科本身的理论建设。

第二，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民族学得到恢复到今天，是民族学获得显著发展的时期。1979年5月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举行，会上讨论了民族学的发展规划。1980年10月民族学工作者自己的学术团体——民族学研究会即今天的中国民族学学会正式成立。这给同行们以极大的鼓舞。学会成立十八年来分别以民族学的学科建设、民族学与现代性、传统文化与民族发展繁荣、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100周年等为主题，包括这次会议共举行了六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11辑《民族学研究》论文集，出版了130多期《民族学通讯》。这些工作促进了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学科的发展。

各地有关教学科研机构先后成立，制定了规划，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近年来，民族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下列主要成绩：（1）在国家民委组织领导下编辑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其中有不少民族学著作。（2）出版了大型工具书和民族学专著、论文及译著。国外民族研究方面，除恢复出版《世界民族译丛》外，还陆续出版了“世界各国民族志丛书”以及其他专著和译著。（3）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正在各地开展，一般主题大都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问题，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的西南地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进行的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最引人注目。但由于经费短缺，各地田野调查工作未能得到应有的开展。

近年来，民族学专业人才除在各教学科研单位实际工作中成

长以外,80年代初,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先后在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博士点和硕士点,陆续培养了不少民族学工作者,成为发展民族学的重要力量和生力军。

20世纪后期,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民族学同社会科学中的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在理论建设和研究方法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改革开放政策执行的十几年,也造就了一批出国留学、攻读民族学和人类学后返国的学者。他们带回来新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同样是促进中国民族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地有关机构和学者与国外同行建立了学术交流和联系。这些有助于我们开拓视野,知彼知己,是探索我国民族学发展的最佳途径。

第三,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这是1995年9月学会大连会议讨论的主题。何星亮同志集中大家的智慧写了一个很好的《纪要》,对今后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大连的研讨会讨论了如下三个问题,在此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1) 关于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的中国化。一百多年来民族学在西方形成众多的学派,各学派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其中一些主要流派都先后传入中国。中国的民族学要在中国生根,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有一个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这在解放前吴文藻先生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有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民族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实际,逐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体系。对于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既不要全盘否定,更不能全盘肯定和照搬,而要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加以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西方民族学在田野工作中总结出的调查研究方法如社区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参与观察、主位和客位研究

方法等，对中国民族学者也是有用的，但似有不足之处。这是由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一般说来，主要是从研究一些比较简单、落后的，甚至是自身并无文字记载的民族社会发展而来，多注重横向的比较研究而忽视历史的、纵向的探索，这和中国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有着明显的差异。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王朝代兴、民族众多、关系复杂而又地区差异极大的民族社会，要对其进行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什么是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就值得我们去认真探索了。大连会议上不少学者指出，历史研究和现状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是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在中国化过程中，应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新，引出新的方法论，这不仅仅是单向的中国化，而且可对国外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复杂的民族社会作出贡献。

（2）关于民族地区现代化

民族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这门学科自产生之初，便与社会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新形势下，民族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研究解决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因而，首先学术应该与应用相结合，应该改变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应该强调学以致用，重点是为民族地区现代化服务。只有学术与应用相结合，民族学研究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民族学研究应当扬长避短，加强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因素的研究。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的发展则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互相影响，相互渗透，应协调发展。民族学者的专长主要是对文化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观念上的差距。由于少数民族在民主改革前多数处于封建社会阶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烙印较深，商品经济观念淡薄以及其它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一些习俗，都有待改革，所有这些都是民

族学者较为擅长的研究课题。

再说，我国的现代化问题，各个学科都在研究，各有自己的理论和着重点。因而民族学的现代化研究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即抓住擅长的族群发展、变迁、族群关系及传统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从历史到现状深入探索民族地区的发展途径。

(3) 关于人才培养

培养大批中国民族学跨世纪的教学和科研人才，是中国民族学在 21 世纪能得以迅速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条件。这里我只想说一点。由于民族学在我国远远不如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为社会所了解，因而一般认为学民族学的人只能到与民族学有关的教学、科研单位或到民委系统工作，这样民族学使用范围有限，也就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规模。其实，正如在许多国家那样，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都是基础学科，是培养通才的学科，许多学科专业的学生都需要具有民族学知识，毕业后才能更好地到各行各业工作，因而对民族学的需要也就越来越大。所以大力宣传和普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知识，与培养民族学专业人才是相辅相成的。

以上看法，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

最后，希望同志们围绕主题积极发言，各抒己见，互相启发，共同努力来开好这次会议。

贺 信

中国民族学学会：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值兹“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的中国民族学学会第六届学术讨论会召开之际，谨向出席这次盛会的全体代表致以热烈的祝贺！

民族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和具有时代精神的学科，因而是为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服务的学科。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调查研究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对我国民族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1950年至1954年的民族识别，推行了实行民族平等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民族地区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通过大规模的对各民族的社会性质调查，从不同民族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形式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使各少数民族分别从原始社会末期或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农村公社和家长奴役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同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例如，我们通过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对保留封建土司制度的傣、哈尼、拉祜、阿昌等少数民族，采取“联合封建反封建”的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政策；对阶级分化不明显、土地占有不集中的景颇、傈僳、佤（大部分）、布朗（部分）、独龙、怒、基诺、德昂等十几个少数民族，采取不分土地、不划阶级、不搞阶级斗争、大力发展社

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等不同政策措施，体现了求实精神和创造性勇气。反之，从1957年下半年以后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由于不从各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不重视甚至放弃调查研究工作，以致提出的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批“民族落后论”、“边疆特殊论”、“条件论”，大搞“一步登天”、“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给少数民族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经验表明：对经济文化特别落后的边疆和内地高寒山区的少数民族，在他们获得解放以后，应当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以补先天之不足，逐步在经济文化上缩小同汉族地区的差距。如果说，汉族地区到下个世纪中叶才能达到现代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末，比汉族落后一个世纪甚至几个世纪的后进民族地区，由于先天不足，加上后天失调，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建国初期，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了解放生产力，把民族经济搞上去，而不是其它，因为阶级斗争不是目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族学开始恢复了生机，进入了重建和发展阶段，整理出版了近一亿字的50至60年代初的调查资料，克服了过去调查中的某些局限，批判地吸收了国外的研究成果，强调了为现代化现实服务的应用导向。回顾新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历程，展望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世界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我们在分析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现状，探讨21世纪中国民族学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寻求少数民族从各自不同的发展水平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途径，在推进我国民族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既面对着严峻的挑战，又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民族是“政治社会”即阶级社会或文明社会的产物，以民族这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外国

传来的，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古代民族”应当包括奴隶制民族和封建主义民族，中国在先秦时期就产生了民族学的思想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具有光辉灿烂的封建精神文明，也就是华夏文明，而孔子就是这个文明的奠基人。与西方殖民主义的民族学不同，孔子思想中既有“尊王攘夷”的糟粕，又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和“柔远人，怀诸侯”的主张民族平等的一面。孟子甚至提出：舜是“东夷之人也”，文王是“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国，若食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区分民族的标准上，不是以血统包括体质和肤色等为标准，而是以“文化”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儒家主张“用夏变夷”的“夏”是当时先进的华夏文化，就是用先进的华夏文化去影响周边的落后民族，改变他们的后进面貌，使之跻于先进的行列。《公羊传》说：“诸夏而夷狄也，则夷狄之”，“诸夏”指当时保持“周礼”最多的鲁国以外的齐、宋、卫等国，意思是说，如果诸夏像夷狄的所作所为一样，则鲁国对诸夏就要像对待夷狄一个样子。《公羊传》又说：“夷狄而诸夏也，则诸夏之”，意思是说，倘若远方的夷狄的行为如同鲁国附近受过封的国家一样，那么，鲁国就要像对诸夏一个样，好好对待他们。孔子正是以文化平等的民族观点对待周边少数民族的。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重用异民族为官，清末康有为借用《公羊》“三世”之说，主张变法维新，都是继承了儒家的民族观。历代开明的封建政治采取“用夏变夷”的政策，以“德”（仁义）和“文”（文字、文化）去化育周边后进民族，这是中国民族观的优良传统，是汉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应当继承这个传统，实现民族学本土化，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学。

既然民族学思想在中国有着古老的优秀的传统，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本族文字或汉文记载的历史，前者如藏族、傣族、彝族、纳西族、白族、满族等民族文字史籍，后者如《山海经》、《史